

評介 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蔡松穎*

書名：*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作者：William T. Rowe
出版時地：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頁數：390pp.

一

在研究日益細密化的今日，學者多傾向於將各自的專長領域範圍縮小，除了時間斷限外，諸如經濟、政治、思想、社會、醫療等次領域間亦不易跨越。這種現象在清史研究上也不例外。在稻葉君山、鄭天挺、蕭一山等前輩學者之後，近年來已少見新的清代通史出版。¹西方的漢學研究亦然，除2003年出版的《劍橋中國史：1800年前的清朝》²外，本書是近年少數幾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¹ 參見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鄭天挺等編著，《清史》（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63）；李洵等主編，《清代全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1993）。

² Willard J. Peters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3).

本清代通史之一。與劍橋中國史採取編著的方式不同，本書純由作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一人主筆，在行文上更能看出作者一貫的史觀與其側重的關注面向，因而無論在歷史解釋或題材選擇上，這都是本有著濃厚個人色彩的清代通史。

本書與作者過往著作間的聯繫處處可見。對於精英階層的關注，由〈成功的故事：湖北漢陽縣的宗族與菁英階層，1368-1949〉一文一直持續至今；³作者兩本以漢口為題的著作中，無論是慈善組織、退伍鄉勇的影響、幫會、千年教派的信眾與叛亂者、排外主義、國家與商業和商人間的關係、太平天國對地方所帶來的影響等處，都成為本書的小節重點；⁴以陳宏謀為主角的《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菁英意識》一書中，對於人口與糧食的變化、理學、新儒學、嶽麓書院及雍正乾隆間的政策轉化等主題的研究，亦成為本書中貫串數章的主軸；⁵2007年所出版的《紅雨：一個中國省分七百年的暴力》，對於奴僕與地主間關係的解析、地方叛亂的深層因素以及太平天國後地方勢力的崛起等關注面向，在本書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⁶然而作者並非單純的沿襲自己舊著中的研究後集結成書，在兩相比較後，可發現作者的論點有所改變，如對秘密社會的解釋，在本書中便有了更細部的探討與分析；對於嶽麓書院的發展及其影響的範圍，亦跨出了十八世紀，一直延伸到了太平天國後的

³ William T. Rowe, "Success Stories: Lineage and Elite Status in Hanyang County, Hubei, c. 1368-1949 " In Esherick and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⁴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中譯本：羅威廉著，江溶、魯西奇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魯西奇、羅杜芳譯，《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⁵ 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⁶ William T. Rowe,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自強運動。這些關聯與改變，都加深了本書的個人色彩與凸顯了作者歷來的研究脈絡，並由此發展，進而全面地貫串整個清朝的歷史。

二

本書扣除前言與結論，共有十章，大致上按著時序鋪陳論述。作者除了解析史事外，同時也常將同一主題的各派學說進行比較。緒論中便將西方漢學界對清史研究的演變作一概要性的整理。西方對於清史的研究由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始，脫不了「衝擊——回應」的論調，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清史研究出現了三個重要的修正。一是年鑑學派的影響，使得史學界的關注重點由政治、軍事轉移到經濟、社會、文明等部份；二是以內亞視野來觀看清朝，這個面向的研究是受到文化史研究的轉變所影響。這個修正一方面帶動了滿洲中心觀點的興起，另一方面能跳脫清朝在十九世紀身為帝國主義侵略下受害者的角色，進而站在內亞的視角去審視清廷的侵略性；三是以世界史與環境史的角度來分析明、清兩朝所遇到的各式危機及其對於明清易代的影響。這些修正使得我們得以重新審視過往以1860年代為界，將清史劃分為兩部份的歷史分期法，以及將晚明與清朝前期視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同質區塊。作者認為：這個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帝國充滿了滿洲特色，是漢文化的統治者所辦不到的。換句話說，在政治面上，中國的早期現代性（early modernity）源自於1644年的清朝入主中原，而非更早的明代。

第一章作者從種族的角度切入，闡述近年清史研究的新觀點。過去的研究認為清朝的歷史即是一段滿族抵抗漢化失敗的歷史，1980年代以後，學者們開始認為清朝所界定的「滿洲」、「漢人」等稱呼，與其說是一種血緣上的區別，不如說是特定時空和政治、社會協商下的產物，且清朝皇帝們成功地維持了他們口中的「滿洲根本」。這種角度即是本章敘述清朝

入主中原過程的主軸。在努爾哈齊與皇太極為取明而代之鋪路後，順利統治中國的多爾袞、順治、鰲拜、康熙等滿洲統治集團中人，始終爲了要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儒家的規矩而煩惱。最後在康熙親政後，透過對漢人態度的改善、籠絡原本的地方士紳與中央官僚，才終於穩固了清朝的統治權。

第二章的內容是清朝的政府組織的創立、運作與效能。整體而言，清朝的機構設置以明朝爲藍本，且有理藩院、內務府、奏摺制度等創新，有效地改善了一些原本存在於明朝的積弊。其施政主要以儒家理想爲目標，如小政府式的仁政、輕徭薄賦、市平法等，都是儒家理想的體現。然而在實際的運作上，無論是陋規的收取或幕友胥吏的龐大勢力，都使得地方政府的規模遠超過會典上的設計。在理解清朝的統治力時，應注意到朝廷在食物供給、貨幣政策與訴訟案件上，都表現得相當傑出。無論是市平法、銀銅雙本位制或以處理訴訟案件爲主的地方官職責設計，都凸顯了清朝政府設計與運作上的成功。然而這樣子的組織架構，當清末遇到接踵而來的挑戰時，便顯得不適宜了。

康、雍、乾三帝在位之時，是清朝的極盛之世，這個「盛清」也正是第三章的標題。作者先依時序，介紹三位皇帝的施政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朝所做的許多改革都在乾隆朝被取消或淡化，而乾隆朝的許多政策對日後產生了負面的影響，這種衰弱可以從18世紀末年的王倫與王亶望事件看出。康雍乾盛世時，清朝採取了帝國主義式的版圖擴張，將保護這些民族視爲一種歷史性的使命，並採取因俗而治的方式管理，然而這些偏遠的地區亦造成了日後的財政負擔。盛清的藝術發展與學術成就亦值得關注，此時期藝術發展受到城市裡中產階級很大的影響，對歐洲的大量出口也反映在部分藝術品的風格歐化上；受到西學與和顧炎武在語言學上的研究影響，多種傳統學門獲得新的運用，使考據學應運而生，並隨後取代朱學成爲官方承認的正統。這個時期的繁盛也使得全清朝最重要的一部著

作《四庫全書》應運而生。

第四章的時間範圍約在康雍乾三朝，作者透過人口、遷徙、主佃關係、種族、性別、仕紳、宗族與慈善組織等子題，想描繪一個並非停滯的「社會」。如清代急遽成長的人口，帶動了邊疆的開墾、糧食的成長與環境的破壞；主佃間的衝突橫亙整個清朝，雍正希望透過給予佃戶合理的土地去改變不合理的主佃制，但這並未為他的繼任者採納；以及康、雍時期風月場所的衰退及其在乾隆朝的復興等。

第五章的主題是經濟。繼宋代在商業型態上的轉變後，十六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的這段時間裡，中國歷經了第二次的商業革命。這次的革命將中國的商業型態轉為循環經濟（*circulation economy*），亦可稱之為貨物經濟（*commodity economy*）。這種經濟型態的特色在於各地區間的分工逐漸細緻化，作物多為販賣賺取利潤而種植，並由商人運送至各地販賣並賺取差價，即便是外國商人的投入也並未能改變這一運作模式。清朝政府對此並未以政令強加干預，反而是以招商的方式利用商人們的力量，甚至讓商人成為半官方的代理人。在對外貿易方面，十五世紀時雖因為海禁而使朝貢成為唯一的管道，但此時只佔海外交易量很小的一部份。乾隆年間的新規定形成了日後的「廣東系統」（*Canton system*），特別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頒佈的三條上諭，控制並限制了外國人的行動（頁141-142）。其規定雖是為了外人的安全與方便著想，但種種限制卻為日後的中西衝突埋下了遠因。

第六章描繪十九世紀初的中國，同時面臨了社會經濟問題的長期累積、王朝壽命的週期性衰弱以及西力的衝擊等三大危機。作者特別強調此時期「言路」的形成，除了為嘉、道二帝應付危機的方式外，亦與人口成長造成的人才過剩（*talent glut*）有關。這造成了嶽麓書院及其校友的興起。此時英國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商人的聲音獲得重視，商業上的不斷進取引發了鴉片戰爭。戰爭及其後續簽訂的條約，讓中國以沒有防備

能力的姿態走入了國際市場。這數十年間，除了不斷衰退的國力外，中國形象亦由原本「人類國家間的兄長」轉為「以狡詐著名的中國」。

儒家理想的和諧社會中，並不包含地下社會（underworld）的成份，然而這卻是現實裡未曾消失的一部分。清朝政府對這些勢力——如盜匪、互助會、千年信仰的教派（millenarian sects）和叛亂者——並非完全阻絕，而是有限度地利用這些傳統組織去彌補自身小政府的模式下統治力的不足。清代的土匪遵從一定程度的正統儒家理想，行俠仗義並未曾反對社會階級。而被現代研究者稱為「秘密社會」⁷的互助會及千年信仰教派等組織則不然。其中千年信仰的教派中含有許多外來宗教的色彩，並致力於塑造新的階級標準。無論太平軍或白蓮教都有著相似的反滿與末世論在其中。太平天國滅亡後，地方精英們藉由基礎建設的重建，取代了政府在地方的角色，並與團練的士兵建立起私人的封建關係，同時稅法的改變也使他們擁有更多的資源。作者指出，由於這些緣故，太平天國比鴉片戰爭更像清朝歷史的分水嶺。

第八章的主題是自強運動。對於「同治中興」，西方學界有四種切入的角度。第一種由費正清所提出，他認為此時期中國對西方接納度與互動的提高，使其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第二種觀點由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提出，她認為對湘軍中的新儒家保守主義者來說，對西學的借用不過是種妥協，然而結果對他們而言無疑是個悲劇。第三種是將同治中興視為地方分權的開始，因為李鴻章等人的個人野心與派系立場，造成稅收轉移與私人軍隊的培植。第四種觀點強調透過自強運動中軍事化的過程，使非官方的地方精英崛起。這四種觀點都肯定一件事：同治中興的影響直至今日的中國。此前清朝皇帝的定位，是一個在各民族間擁有不同身分的共同統治

⁷ 作者認為以這個詞來概括這些組織的作法有待商榷。特別是「秘密」一詞並非這些組織共有的特色，更甚者，他們彼此間的相似處還沒有差異處來的大。見 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p.178。

者；在這段期間，他將自身的角色漸漸轉化為一個西方定義下的國家君主，而他所統治的國家名為「中國」。過往的研究多著重於自強運動為何失敗，而作者則傾向於討論其是否失敗。因為無論從中國海軍軍力與當時日本的比較、船運業與紡織業的獲利、小規模工業的發展等等角度來看，過去對自強運動的評價都是有待商榷的。

甲午戰爭中日本所展現的實力，使西方各國對於「黃禍」的恐懼感再現，因而對中國的態度轉為侵略。這種帝國主義式的侵略在中國所帶來的影響，便是第九章所要表達的課題。中國對帝國主義的反應除了激進的改革與革命外，以義和團為代表的排外主義（nativism）也是其一。在這些手段的背後，朝廷官員們的自身利益影響著各自的立場，甚至會讓同為洋務派的官員互相否定對方的改革政策。與此同時，地方菁英繼續鞏固自身勢力，並跳脫原本的視野，將目光放到整個中國。透過報紙，他們彼此間的接觸變得緊密，而且開始認為：他們能比朝廷做的更好。

第十章的主題是辛亥革命。西方學界對辛亥革命的觀點，長期以來受到國、共兩黨各自解釋的影響。先是由關注於孫文個人的重要性，轉向黃興、宋教仁等協助者，在發現孫文的重要性不高後，再轉向學生與知識份子。與此同時，發現了這場革命甚至不能稱之為革命——因為它並沒有改變任何東西。現在，西方學者強調個人與地方利益的交互作用，也是作者於本章所想表達的觀點。在這場革命中，學生與革命黨僅發生推波助瀾的作用，真正行動與造成決定性局面的，則是士人、商人與介於兩者之間的紳商。清朝的改革只顧維護自身利益且步調過慢，限制過多的環境無法滿足紳商的需求，於是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偶然發生的武昌起義才能獲得各省議會與軍隊領導者響應。

作者認為，若不將清朝與洛曼諾夫王朝（Romanov empire）等歐亞早期現代的大陸型國家放在同一個脈絡下，而是以

傳統中國的王朝循環觀點來看，屬於「清」的這個時代並未隨著辛亥革命的到來而結束。辛亥革命以後，社會環境等並無太大的變化，國家機構的改造與公權力在地方的擴張等趨勢也未有所改變，更沒有一個政府真正強而有力地控制並奠基於此。直至1927年國民黨人的清黨、1937年的日本入侵抑或1949年中共建國，這個屬於清朝的循環（cycle）才算真正的結束，而其影響持續至今。

三

本書除了按照時序分門別類地論述之外，也介紹了一些西方漢學界對於清史的切入面向，這些面向也同時成爲作者關注的焦點。其一是鄉紳（local gentry）與地方精英（local elite）的問題。西方漢學界對於gentry一詞運用到中國時該如何定義與運用始終是個熱門的問題，由張仲禮、何炳棣到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和瑪麗蘭欽（Mary Backus Rankin）所主編的*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一書，以至於近年對中國政治史、社會史的研究，都難以脫離這個概念。作者在本書中，認爲gentry一詞的定義不單是「藉由國家考試取得功名、享有特權者」，在私人領域的範圍內甚至可以擴大到其親屬。這種強調由權力運作的方式去界定gentry一詞的作法，與周錫瑞和瑪麗蘭欽等人相同，⁸都是受到社會學影響而生的分析角度。

另外一個明顯的面向是種族（ethnic），無論是滿洲統治者的種族意識、多民族國家因俗而治的統治手法，抑或清末的滿漢衝突，都是屬於這個脈絡下的產物。對於清史學界——特別是西方漢學界——而言，這並不是一個陌生的觀點，自羅友枝（Evelyn Rawski）與何炳棣的論戰之後，便一直是羅友枝、柯

⁸ Mary Backus Rankin and Joseph W. Esherick. " Concluding Remarks " In Esherick and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p.305.

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所提倡的「新清史」所注目之處。⁹源自於對傳統「漢化」說的否定，新清史對族群性（ethnicity）的關注，強調滿族的自我認同及族群意識，是近年研究清史的學者所無法迴避的面向，甚至以此為基礎對清史有了更進一步的解讀。¹⁰作者也是以「滿洲中心」的觀點進行寫作（頁13），並在此前提下對滿洲統治者的心理進行描述。除此之外，作者並未因此而忽略帝國中的漢族成分，甚至多次強調既有的漢族傳統是如何影響清朝，由文化、政府架構甚或地方勢力，都處處可見明朝的影子。這種並未偏廢任何一方的作法，堪稱周延地表現了清朝的特色。

除了以上兩個切入面向外，「西方的看法」亦為此書的一大特色。這個特色下又可細分為二：一是史料的取得與背景研究，二是對漢學界的研究回顧。相較於中國、臺灣方面的研究，西方學者有著一個優勢，即為對歐美方面史料的取得及其歷史的了解。這點在書中明確地反映出來，無論是清初中西方的貨物交流、傳教士的想法、清末中西衝突時外人行動的動機與背景等，都有著更為深入的解析。另一方面，本書對於漢學界的重要研究著墨甚多，特別是研究取徑的轉變與衝突。這使得讀者除了了解作者個人所支持的看法外，對研究史與其餘學派的見解也能獲得相當有系統的認識。

就整體內容而言，本書較像是一本對於西方漢學界清史研究的研究回顧。相較於作者過去的數本專著，本書並沒有直接對一手史料做出的分析，抑或觀念上的突破，書中的觀點多為整理過往研究所得，再經由作者個人的篩選匯集而成。此舉固然難免被認為在開創性上有所不足，但依然有下列貢獻：對於

⁹ 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24：2（臺北，2006.12），頁11-15。羅友枝與何炳棣的論爭及新清史的發展，可見王成勉，〈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收於汪榮祖、林冠群主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頁57-81。

¹⁰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6（臺北，2006.12），頁135-192。

一般讀者，作者提供了一個清楚且全面的介紹，有系統地依照時序解析清朝歷史的定位與特色，並點出了史學界所關注的焦點為何；對研究同行，本書闡述歷來相關議題的研究動態與近況，並將各種論點進行比較與分析，有興趣者亦可按圖索驥，發揮目錄的效用。就這點而言，作者同時照顧到兩方面的讀者，應足以稱為一本成功的清朝通史。

除了上述優點外，本書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問題。其一是對於努爾哈齊施政目的的判斷。作者認為：「這三個領袖（按：指努爾哈齊、皇太極與多爾袞）為了使自己的臣民對征服明朝做好準備所作的施政，包括組織滿洲民族共同體、實行中央集權以及（有爭議性的）漢化。」（頁14）然而，在天聰元年皇太極出兵攻打錦州前，曾於致袁崇煥書中提到：「我皇考太祖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入處漢地，易世以後，皆成漢俗。因欲聽漢人居山海關以西，我仍居遼河以東，滿漢各自為國。故未入關，引軍而返。」¹¹明顯地點出努爾哈齊並未有入關乃至於征服明朝的念頭，這也是努爾哈齊對明政策與皇太極最為不同處。¹²其二是本書並沒有編列中英字彙對照表，使一些專有名詞在查核原典上產生阻礙。雖然作者並未明言，但相較於其過往著作，本書的讀者群並非設定為專業研究者，而是一般群眾，或許是因此才省去了對照表。其三，作者雖曾對gentry一詞下了詳細的定義，然而行文中對這個詞的使用卻常讓人頗費思量。如在提及太平天國戰後地方團練的崛起，以及清末地方政治中的特色時，作者便常以local gentry與local elites二詞交互

¹¹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三，頁4，天聰元年四月甲辰條。

¹² 皇太極對於入關的看法，《嘯亭雜錄》裡有這麼一段記載可為佐證：「松山既破，擒洪文襄歸。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頭跣足，誓不休，文皇命諸文臣勸勉，洪不答一語。上乃親至洪館，解貂裘與之服，徐曰：『先生得無冷乎？』洪茫然視上久之，歎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頭請降。上大悅，即日賞賚無算，陳百戲以作賀。諸將皆不悅，曰：『洪承疇一羈囚，上何待之重也？』上曰：『吾儕所以櫛風沐雨者，究欲何為？』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獲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也！』」見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一，頁2-3，用洪文襄條。

使用，由文義上並無法分辨兩者間的差異。（頁195、250-252）然而elites一詞的意涵顯然比gentry來的更廣，這點可在本書第十章得到清楚的證明：此章論及清末的改革派精英（reformist elite），將其分為傳統商人、紳商（gentry-merchant）與新式的士紳（new-style gentry）三類，可見gentry只是elite的其中一部分。諸如此類名詞定義與使用上的問題，易使讀者產生混淆，這是因為gentry一詞所蘊含的概念並非清朝歷史中所固有，而後人又因各自的解讀而眾說紛紜之故。雖然這種概念的引入能對既有史實做出新面向的解釋，但在使用上自應更加謹慎才是。

然而，以上所述的缺陷終究不過是支微末節。若從宏觀的視角來看，更該問的問題是：作者為何要寫本書？本書應如何定位？由書中內容可見，作者所採觀點及其關注的議題與「新清史」關係至深。¹³且作者在前言與結論中，都曾提及清朝是個不斷變換的研究對象，不但擁有許多尚未解決的爭議在，且在推翻了過往的錯誤概念後，我們對於它在某些方面的理解才正要起步。由此觀之，作者或許是將本書定位為一部承先啓後之作，以自身過往的研究成果作為本書的脈絡，並在回顧了研究史後，以新清史的角度作為其主要切入面向。這種寫作方式與題材挑選，在過往的清代通史中均不曾見。若與專題式的研究相比，本書在內容上更為廣泛且面面俱到；若與集眾人之力所修纂的通史而言，本書的脈絡性則更強，可見一以貫之的史觀橫亙全書，且不易給人各個章節之間毫無聯繫之感。作者在專題研究上取得莫大的貢獻後，轉身獨力投入了這部清代通史的撰寫，這不但打破了近年來似乎非得集眾人之力方能著作通史的迷思，更展現了在研究日益細密化的今日，一種由個人撰寫通史的方式：以自身的學養及史觀做為骨架，酌量介紹各家學

¹³ 此處所言「新清史」並非如歐立德在〈滿文檔案與新清史〉一文中所言，僅著重於非漢族觀點以及滿文材料；更接近Joanna Waley-Cohen在”The New Qing History”一文中所提到的各式新研究課題，甚至包含了性別、宗教與儀式、公私領域等等。見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頁1-15；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 2004), pp. 193-203.

說並採納其中認同者，最後再將其融會成一部兼具廣度與深度的著作。然而要到達這種境界，無論是自身學說的建立或對百家學說的理解，非得有深厚的學力方能企及，而作者正以本書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示範。